

浅论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——以符号学为视角

黎世珍

(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—传媒学研究所,四川 成都 610064)

摘要: 本文利用符号学中的伴随文本等相关理论对纬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型文本、前文本、元文本等进行研究,探讨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中国古小说史上的地位。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记载了大量叙述完整、情节生动的神话故事,具有浓郁的小说特色,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可以说是上承《山海经》,下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,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
关键词: 符号学; 河图; 洛书; 伴随文本; 古小说

中图分类号: H0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8-6382(2016)03-0030-05

纬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汉代有很高的地位,是汉代“七经纬”(《易》纬、《诗》纬、《书》纬、《礼》纬、《乐》纬、《孝经》纬、《春秋》纬)之外的重要经典。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与“七经纬”相比有很大的区别,内容上包括天文、地理、巫术、帝王传说与神灵鬼怪等各个方面,带有虚幻迷离的神奇色彩;在故事叙述上,情节完整,想象丰富,带有浓郁的小说特点。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这些稀有的特质使其成为研究古代风尚、习俗、传说等的珍贵材料,同时对于研究中国古小说^① also 具有很重要的价值。较早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之《正纬》篇中已经发现纬书的文学价值所在:“若乃羲、农、轩、皞之源,山渎钟律之要,白鱼赤鸟之符,黄金紫玉之瑞,事丰奇伟,辞富膏腴,

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。是以后来辞人,采摭英华。”^[1]刘勰认为纬书“有助文章”,为后来研究纬书文学价值的学者指明了方向。在刘勰所著的《正纬》篇中,主要从“为文”的角度去论证纬书“有助文章”,若非如此,《正纬》篇将失去原本的意义。目前,学界大多认为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区别于经文表现手法,带有诸多文学特性,上承《山海经》,^②下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,并对汉代的小说、汉乐府和神话有重要影响。鉴于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文本本身,本文试图结合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伴随文本,从符号学的角度去探讨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中国古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,希望能起到“引玉”之效。

收稿日期: 2016-04-26

作者简介: 黎世珍(1990—),女,湖北恩施人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—传媒学研究所成员,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符号学研究。

^①学界多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,本文采用这一界定。

^②谭光辉:“意境”理论的符号学原理[J].符号与传媒,2012(2).

一、缺席：无奈隐退的《河图》《洛书》

首先,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,即为什么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为代表的纬书在中国古小说史上处于可有可无甚至是缺席的状态?换句话说,自东汉以降至今约2000余年,纬书的文学价值为何一直受到质疑?如桓谭称“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,增益图书,矫称讖记”^[2],认为此类纬书乃小才小慧之人所为,没有太大的价值。魏晋之后,人们认为纬书“文辞浅俗,颠倒舛谬,不类圣人之旨”^[3]。至鲁迅编纂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梳理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脉络,为中国小说史开疆奠基,对神话与传说、经学典籍、志怪小说等皆有论及,但也是只字未提汉代纬书。其后两部重要的文学史(游国恩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与袁行霈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)也是基本沿袭鲁迅对中国叙事文学发展轨迹的概括:神话—经史—志怪。实际上,神话与志怪虽然看似不相关,但渊源颇深,志怪中包含了不少神话因子;志怪与经史虽近,内容却是大相径庭。因此,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:经史如何迅速演变到志怪?

根据符号学理论,对文本进行分析需要伴随文本的协助,因为“每一个意义平面当中,又可包含其他意义平面,即任何平面均有可能影响另外的意义平面”。^①换言之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文学价值的缺失定有一个或几个与之相关的意义平面在同时起作用,仅仅关注某一个层面不利于对其他平面进行挖掘和审思。李剑国先生在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开篇即谈道“我国唐以前的小说,通常称为古小说。以区别于唐宋传奇小说、宋元话本小说和明清章回小说。古小说是小说的原始形态。”古小说作为小说的原始形态,其写作方式、思维情感、内容包蕴、风格形成等对后来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“古小说种类较多,可分为志人小说、志怪小说和历史小说。”^[4]李剑国先生将古小说中的志怪小说单独

列出并独自成书,可谓用心良苦。一则,志怪小说的研究向来零散无章,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可谓是志怪小说研究的垦荒之作。二则,将志怪小说单独列出可以估量志怪小说于古小说的价值所在,正如汉代纬书于志怪小说的价值一样。可以说,自汉代始,小说家便与纬书结下不解之缘,他们在创作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纬书中的相关内容。如东汉赵晔所著的《吴越春秋》是一部“半小说性的杂史”^{[4]139},受纬书影响较深。凡事之有渊源者,皆应该探源析流,方能找到演变的痕迹,于中国古小说的研究更该如此。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言“不追溯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、魏晋南北朝的搜神志怪,就不能了解唐传奇产生的基础和宋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由来;不分析受魏晋士大夫的清淡之风的影响而出现的《世说新语》式志人小说的社会因素,就无法知道唐人的《隋唐嘉话》《大唐新语》之类笔记体裁的沿袭和内容的演变。”^{[4]1}然而,今人在研究中国古小说时,往往忽略纬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重要价值,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

纬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自魏晋以后由于官方不断地排斥和禁毁,相关文献几乎亡佚殆尽,加之今人主要是对纬书的文本进行分析研究,因此,从伴随文本的角度出发,或许能为纬书文学价值的缺席找到一些可靠的理由。“在相当程度上,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。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,隐藏于文本之后、文本之外,或文本边缘,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,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。”^{[5]143}伴随文本极大地影响了文本的意义,从某种程度上说,要深刻、全面地阐释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文本就不能将其排除在外。

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“体裁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伴随文本,作为型文本的“体裁”牵涉到了最根本的问题,即纬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到底算不算小说?目前,学界对于这个问题依然争论不休,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今人之小说观念作为衡量古

①谭光辉.“意境”理论的符号学原理[J].符号与传媒,2012(2).

典小说的尺度,因为小说自身的发展表现出了从幼稚到成熟、从不完善到完善、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。但是,也有学者认为古小说也理应具有小说的某些特性。李剑国先生提出了四个划分原则:叙事原则、虚构原则、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^[6]。认为符合这四个原则的就是小说,反之则不是小说。以此作为标准去审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,便会发现其中许多篇目或者片段颇似小说,或者说就是小说。例如:

“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,即禹藏真文之所,一名包山。吴王阖闾登包山之上,命龙威丈人入包山,得书一卷,凡一百七十四字而还。吴王不识,使问仲尼,诡云:赤鸟衔书以授王。仲尼曰:昔吾游西海之上,闻童谣曰:吴王出游观震湖,龙威丈人名隐居,北上包山入灵墟,乃造洞庭窃禹书,天帝大文不可舒,此文长传六百初,今强取出国庐。某按谣言,乃龙威丈人洞中得之,赤鸟所衔,非丘所知也。吴王惧,乃复归其书。”^{[7]1187}

这则故事较为完整生动地叙述了君权神授、君权不可妄取的故事,着力刻画了阖闾、仲尼等人物的形象,故事情节也较为曲折。在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中,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。理论上,这些故事可以被认为是小说。但是,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充其量只是小说的发轫,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小说。如聂济冬认为,“从其上承《山海经》的内容和思想,下启魏晋志怪小说、唐传奇的‘奇异’来说,汉代纬书《河图》不自觉地参与了小说的发轫,是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”^[8]。聂济冬很谨慎地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看作是古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环节,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古小说史上的地位,因为古小说发展中的每个环节都不可缺少。

但是,型文本“体裁”的不确定无疑为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文学价值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。不少学者认为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这类粗陈梗概的“丛残小语”根本不能算是小说。但是,在逐渐

开放的学术环境中,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认识到,简单地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视为迷信、庸俗之作而完全无视其文学价值已经有失偏颇,且无益于讨论。例如,台湾学者吕凯先生在《郑玄之谶纬学》中肯定了纬书的价值,李剑国先生在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中谈到“两汉志怪生长发展的基础和条件”时单独列出一节讲述“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的兴盛”。他们的研究让曾经的“丛残小语”在中国古小说史上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。

二、《山海经》: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前因

对任何事实的认定,都需纠察前因后果、探源析流,忽略某些重要的因素可能导致结论不准确。因此,若需确立纬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中国古小说史上的地位,就不得不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出现前后的因与果进行细致探讨。

“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……狭义的前文本比较明显,包括文本中的各种引文、典故、戏仿、剽窃、暗示等;广义的前文本,包括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。”^{[5]47}总结起来,前文本实际上是产生文本时全部文化条件的总称。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而言,其前文本是非常多样和复杂的,本文仅选取与文章相关的前文本进行分析。《山海经》作为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前文本之一,中国神话的渊薮,包含着汉代以前最丰富的神话资源,记载有大量神话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,二者又相互渗透、融合,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。例如,《山海经》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^①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对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。《山海经》无疑具有准志怪小说的特质,有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:“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胡应麟。他虽一方面以为是‘周末都邑薄也’,同时又注意到‘偏好语怪’的内容特征,因而又其谓‘古今语怪之祖’。”一方面,对《山海经》的内容和语言风格的剖析已经可以支撑其成为“古今语怪之祖”这一盛

①参见沈士军《谈〈山海经〉的信仰民俗及其文学价值》一文目录。

名^{[4]111}。由此,我们可以看到《山海经》在中国古小说史上的地位。本文此处对《山海经》的文学价值做较详细的介绍并非本末倒置,而是为了证明作为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前文本的《山海经》在古小说中的地位,并由此证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文学价值。

《山海经》作为前文本,必然与原文本有某种关联。一方面,就作者而言,主体都是方士。汉代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种不同类型的“士”:儒士、方士和文士。过去,人们认为方士是从事方术的,与迷信紧紧联系在一起,闭口不谈方士与文学的关系。实际上并非如此,大量的史实可以证明方士与文学的关系紧密。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汉代小说,绝大部分为当时的方士所作,遗憾的是,这些小说现在都佚失了。不过,现在也还存在见录于《艺文志》的汉代方士小说。”张兴杰在《论方士与汉代小说》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方士与小说并非毫无瓜葛。因此,方士所著的《山海经》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等,在古小说史上有重要的地位,不能再以迷信、庸俗的眼光视之。另一方面,就内容而言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对《山海经》有继承亦有发展。《山海经》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神话,有地理神话、宗教神话、历史神话、民俗神话等,可以说是中国神话的渊薮,并且神话主题鲜明,叙述情节较为完整。如“洪水滔天。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,不待帝命。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。鲧复生禹。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”(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)这段神话讲述的是鲧禹为济世救民而冒死治理洪水的故事,体现了先民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。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中类似的神话也随处可见,如“黄帝摄政前,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,并兽身人语,铜头铁额,食砂石子,造立兵杖、刀戟大弩,威震天下,诛杀无道,不仁不慈。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。黄帝仁义,不能禁蚩尤,遂不敌。黄帝乃仰天而叹。天遣玄女,授黄帝兵法符,以服蚩尤。”^{[7]1220}这个神话讲述了黄帝为民除害,在天女兵法符的

帮助下,诛杀蚩尤的故事,同样具有大义精神。诸书内容和精神主旨相近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是巧合。

三、志怪小说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影响

人们习惯从顺向思维出发,对一些概念和问题加以辨析。比如,从魏晋南北朝搜神志怪推演到唐传奇、宋平话;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等相关神话传说文本推演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(以下简称志怪小说)。或许,尝试用逆向思维能使我们从唐传奇、宋平话中看到志怪小说的精妙,又从志怪小说的妙处看到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别致。这种“逆影响”研究往往能拨开迷雾,直达本质。赵毅衡先生曾用一个精辟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思维:“《红楼梦》的成就,使我们看清了《金瓶梅》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大意义,成为后人读《金瓶梅》时无法忽视的原文本,而文学史关于《红楼梦》及其他‘世情小说’的评价,也成为《金瓶梅》的间接元文本。”^{[5]148}换言之,追述志怪小说在古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,直接关系到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古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。因此,只需要论证清楚两点,便可以明晰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古小说史上的地位:一是志怪小说在古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如何;二是志怪小说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关系。

志怪小说是六朝小说的代表作品,这已是今人的共识。学界一般认为志怪小说的出现,标志着中国小说观念的觉醒和中国小说的起步。“魏晋志怪作家自觉的审美意识和美学追求,不独是志怪小说成立的契机和动因,同时还是中国小说观念觉醒的显著标志。”^[9]从这一评价可以看出,魏晋作家审美意识的觉醒是志怪小说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,并且这种自觉的审美意识已经成为这时期作家创作时的普遍心理。然而,这种自觉审美意识的培养并非在朝夕之间,而是在经历过漫长的黑夜之后才拥有这样的觉悟。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察,则可以认为魏晋玄学之后,相

关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诗性表达的境界。^① 对于中国古小说来说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所呈现出的原始思考成果难能可贵,研究者不应忽视。

从内容上说,志怪小说是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相关题材的继续深入挖掘。在《河图》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地理博物内容,如《河图括地象》《河图玉版》等。这时期的地理博物记载较为简单,形象并不很丰富,情节较为零散,但是已经初具雏形。例如,“天有五行,地有五岳。天有七星,地有七表。天有四维,地有四渚。天有八气,地有八风。天有九道,地有九州。”^{[7]1090}。虽然其中的“五岳”“九州”等词语一直沿用至今,不过这时对地理博物描写还仅仅停留在平铺直叙上,缺乏一定的想象能力和虚构能力,先民用自己仅有的对世界的认知进行幼稚的描写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文人对这些内容加以改编、润色和扩展,创作了诸如《十洲记》《括地图》《神异经》《洞冥记》等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,其中以西晋张华的《博物志》最为著名。“张华字茂先,挺生聪慧之德,好观秘异图纬之部,摭采天下遗逸,自书契之始,考验神怪,及世间闾里所说,造《博物志》四百卷,奏于武帝。”^[10]文献记载虽不能直接证明《博物志》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有关,但是“好观秘异图纬之部”确能证明张华与方士之术有某种关联,这种关联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的背景内容虽有差异,但是并非毫无继承。从文献可以看出,这时期所描写的故事已经具有了词采华茂的特点,并且开始注重细节描写。如《博物志》中描写蜀山猴獾的文字形象生动:“蜀山南高山上,有物如猕猴。长七尺,能人行,健走,名曰猴獾,一名马化,或曰猱獾。伺行道妇女有好者,辄盗之以去,人不得知。行者或每遇其旁,皆以长绳相引,然故不免……”^[11]

从艺术手法来看,志怪小说已经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偶尔使用的虚构手法发挥到可观的地

步。志怪小说的作者们似乎对虚构手法的运用已经形成一种自觉,具有独立的虚构意识和审美意识。《洞冥记》《搜神记》和《拾遗记》等志怪小说已经将虚构手法圆融地运用到作品之中。由此可见,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从内容上和艺术上推动了志怪小说的形成和发展,应当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刘勰.文心雕龙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2:40.
- [2]范晔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:960.
- [3]魏徵.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:941.
- [4]李剑国.唐前志怪小说史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4.
- [5]赵毅衡.符号学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2.
- [6]李剑国.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[J].武汉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,2001(5):588.
- [7]安居香山,中村璋八.纬书集成(下)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4.
- [8]聂济冬.简论纬书《河图》的小说特性[J].孔子研究,2005(3).
- [9]刘明琪.志怪小说:遥远的呼应与承接[J].北京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98(2):22.
- [10]王嘉.拾遗记[M].齐治平,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:210.
- [11]张华.博物志校证[M].范宁,校证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:36.

(责任编辑 安然)

^①杨赛.从语义三角到语义圈[J].符号与传媒,2015(1).